

李浴日军事思想述略

李桂生

近现代中国有一位伟大的兵学家，由于近现代以来两岸政治与历史等原因，一直未能被当代中国学界所重视，此人就是李浴日。在两岸政治关系趋向和缓、经济文化日益互动、民众隔膜渐消的今天，已经到了客观冷静地对待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的时候。所以，以求知求真为己任的学者应该担负起对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及其思想，从学术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梳理，为学界和社会提供某些鉴戒。

李浴日（1908-1955）是广东省海康县（今雷州市）人，其先祖为唐朝名将李晟。青年时期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后并入复旦大学），后到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系。回国后历任国民党国防部政治厅宣传研究会副主任、国防部新闻局第二处副处长、广东省编译室主任、世界兵学社社长、国民党第 35 集团军少将参议、广东省参议员、黄埔军校教官、中国陆军大学教授、台湾金门防卫高参等职。1950 年春举家赴台，1955 年病逝于台北，时年 47 岁。当时有挽联赞曰：“兵学数权威，无谁能比；文章能救世，惟子有之。”（《战斗月刊》4、5 期合刊，42 页，1955 年 9 月金门）

李浴日是著名兵学理论家，与同时代的蒋百里、杨言昌、杨杰、林熏南等齐名，其军事思想主要集中在《兵学随笔》一书。他毕生精研兵学，学贯中西，著述宏富。1941年在广州创立世界兵学社，编辑出版《世界兵学》（月刊），1950年在台湾金门创办《战斗》（月刊），观察与研判当时政治与军事形势，介绍与翻译西方兵学，整理与研究中国兵法，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兵学体系，主要著作有《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孙子兵法新研究》、《孙子兵法总检讨》、《孙克兵学新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兵学随笔》、《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抗战必胜计划》、《中国兵学大系》等，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兵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

笔者近来研读李浴日宏著，多有启发和收获，惊叹其在军事上的奇思异构，然对其思想不敢妄自发挥，仅就李浴日军事思想作一忠实的梳理与概述，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李浴日研究，并对李浴日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一、战争观

（一）战争的定义。自古至今，各国兵学家对战争的定义不尽相同。有的说，战争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有的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有的说，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或部落之间、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最高形式的暴力手段。李浴日则说：“战争是全球各民主国家发挥全力以粉碎侵略，屈服敌人，而维持民族国家之生存及保障世界之和平的行为。此行为包括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的一切战争行为。”（《兵学随笔第一辑·战

争的定义》)李浴日对战争的定义显然是从战争的正义性角度来进行的,排除了战争的非正义性,由此可见李浴日所主张的战争是抵抗侵略、维护国家和民族独立、保护世界和平的战争,而非侵略战争。不仅如此,而且把战争扩展为包括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的一切战争,改变了以往人们所认知的战争乃局限于军事对抗的战争。尽管在今日看来这并非振聋发聩之观点,但在当时确是对战争定义的一大进步。

(二) 战争的性质。李浴日说:“战争是一种病态,发生于腐败的国家与不合理的世界。”(《兵学随笔第一辑·战争的发生》)根据这个观点,也可以表述为战争就像人体里长出的瘤子、脓疮,是某种病变。战争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数以万计,因战争而伤亡者亦不可胜数。显然,这与人类的愿望和文明的进步是不相符的。

(三) 战争的预防。李浴日认为,要防止战争的发生,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一种有政治远见的战争观,它深刻地认识到了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政治与战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李浴日说:“所以,为避免内战,唯有先把自国的政治搞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为消减国际战争,唯有先把世界合理地建设起来,即先要消灭民族间彼此的对立和剥削,进而建立自由平等的国际新体制。否则,内战将无限制发生,世界大战也是连续不绝。”(《兵学随笔第一辑·战争的发生》)

(四) 战争的特质。李浴日说:“战争是火,是火之力的发辉。

火之力的构成是什么？是感情意志之火，是科学物质之火。前者可以说是无形的火，后者为有形的火，两者不能分离，要作混合的使用。其力量愈大，则战争愈猛烈，而范围亦愈广泛，不问前方或后方，不论地面或海洋或天空均沦为火神跳舞之场。”（《兵学随笔第一辑·战争是火力的发挥》）李浴日抓住了战争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的本质特征，把战争表述为“火”。常人对战争的这一特质熟视无睹，但是李浴日却能抓住这一本质特征并表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思。

（五）现代战争的形式。李浴日说：“现代战争是全体性战争，即动员全国的力量用于战争的竞赛上，其形态分为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军事战，但仍以军事战为骨干。亦有人主张以思想战为中心。平时要作战时看，战场则不分前方与后方。军事战一经开始，所有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便以新的姿态配合军事战作全体性的发挥。”

（《兵学随笔第一辑·全体性战争》）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全面战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欧洲战争的发展趋势中，于1854年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于1935年出版了《总体战》一书，系统地阐述了“总体战”的理论和原则。其核心思想是，动员全体国民参加事关民族存亡的战争，主张国家的一切领域都要服从战争准备与实施的需要，以保证争夺生存空间战争的胜利。从上述两个含义看，“全面战争”是指全民族、全国家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的需要。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日本原田稔和法国博福尔提出总体战或全面战争，是包括武力战、政治战、外交战、经济战、思想战等在内的战争或斗争。显然，李浴日是在研究了“总体战争”

含义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充分吸纳了切合当时战争实际的含义，综合了“全面战争”与“总体战”的基本含义，从而提出“全体性战争”的概念，并加以阐释。

（六）战争的时空。李浴日对战争时空有辩证而高明的见解，说：“侵略者因自国资源的贫乏，在争取空间，故德国地略学家勒尔氏就有「战争是为争取生存空间」的倡导。抵抗侵略者因自己力量的弱小，在争取时间，故我国全面抗战之始，便有「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决策。空间的完全征服为侵略者胜利的完成，但广大的空间，往往变为侵略者的虎口，日本的侵华，德国的侵苏，可为左证。至于以空间换取时间，是有限度的，倘若换到不可换时，犹未养成转守为攻的力量，那就要变为换取灭亡了。时间与空间是支配战争胜败的因素。我们看见许多侵略者为争取空间而失败，我们又看见许多抵抗者换取了时间，而仍无法恢复空间。固然侵略者是必败的，但抵抗者还要好好地利用换得的时间，才能从侵略者的魔手里，夺回原有的空间。所以换取时间，仅是抵抗者的手段，而夺回原有的空间，才是抵抗者的真正目标！”

（《兵学随笔第一辑·时间与空间》）

（七）赢得现代战争的条件及支配战争的因素。李浴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以往战争的不同，以发展的观点研究战争，认为现代战争是机械化战争，必须掌握制空权、制海权，并在陆地上有广阔的作战空间与物资保障，这样才能赢得胜利。他具体论述道：“现代战争，以空军的发达，野战军的增大，机械化装备的进步及军需品消耗的惊人，已使限制于局部的内线作战的往昔战争指导，不能适用于今

日了。现代战争，基于上述的需要与维持，要确保有资源丰富的广大空间，并控制着有关系的海洋与上空。在二次大战中，像英国孜孜地保持其三岛的安全与海外的交通，德国扩大其所谓‘欧洲大空间’，日本建设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个意义的说明。在现代战争中，仅仅把守着每一个军事上的堡垒，是不够的，还要确保着资源丰富的广大地域。在二次大战中美国之所以制胜，即在能够确保着广大的本土。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持久抗战，亦赖于保持半壁河山，一面力谋自给，一面争取外援。”（《兵学随笔第一辑·战争与空间》）

在这个基础上，李浴日提出支配战争的因素是精神力、生产力及科学技术，并以此为理论依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必定是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的。李浴日说：“日寇德虏欲以短期的闪击战，取得决定胜利的时机是过去了，战争快要转入盟军的总反攻阶段，而支配这个战争的因素，是精神力、生产力及科学技术。同盟国正具有这些优点，由此便可推断我们胜利的必然性了。”（《兵学随笔第一辑·支配战争的因素》）

二、国防观

（一）强调国防之重要，不仅要制陆制海，而且要制空，实现海陆空一体化防卫。李浴日说：“没有国家则国民的生活不得保障，没有国防则国家的生命不能保存。过去的军事国防仅限于陆与海的平面，今后是进入于陆海空的立体时代了。过去用一线式的筑城，可以收效。今后的敌人已变为飞鸟式的，纵有篱围亦阻止不住飞鸟侵入其中偷吃晒谷，同样用平面的防御力量亦不足以阻止从天而降的敌人

（指降落伞部队及空输步兵）。所以一国的国防，要掌握着制陆制海权，还要掌握着制空权。”（《兵学随笔第一辑·国防的趋势》）这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以往战争不同特点所作出的理论概括。根据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相交前后发生的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来看，现代战争已发展为海、陆、空、天、电一体化的战争，已由机械化战争演变为信息化战争。

（二）国防的最高原则是制敌于国门之外。李浴日说：“国防的最高原则，应是制敌于未发之先，御侮于国境之外。”（《兵学随笔第四辑·海空权漫谈》）

（三）海国国防有三线。对海国国防，李浴日有精辟论述：“海国的国防有三线。海外为第一线，沿海为第二线，国内为第三线。第一线被敌攻破；尚有第二线，第二线被敌攻破，则须在第三线阻敌。但第一线未被攻破，第二线自可安然无恙，同样第二线未被攻破，第三线亦不会受敌（非指敌之空军）。虽然，但是并不是说第一线未被攻破，而第二线的防御力薄弱之点，无受敌奇袭的可能。同样，第二线未被敌攻破，第三线的不设防或防御力薄弱的地方亦非无被敌偷袭的危险。要之，第一线纯为海军支撑，第二线为海陆两军协同支撑，第三线则纯为陆军支撑（自然均附空军）。最后如第一线被敌攻破，第二线亦告失败，而退守于第三线时，则大祸来临了。故善防海者，必求击破敌海军于第一线之外，正如明代贤相杨溥说：‘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兵部尚书翁大立说：‘拒之于海外，毋使入港为上策，却之于沿海，毋使登岸为中策，迨至登陆而围歼之为下策。’”

今日日本设置的国家防御有所谓第一、第二和第三岛链已充分验证了李浴日的天才构想。（《兵学随笔第一辑·海国的防线》）

（四）国防疏备乃由于人之惰性。李浴日从人性学角度阐述国防问题，认为大凡国防荒疏，都由于人之惰性。李浴日详解曰：“大凡人类各有惰性，平时忘了战时，治世忘了乱世，以致国防不修，敌人乘虚而入，宋之亡于元，明之亡于清，即由于此。”（《兵学随笔第一辑·平时要备战》）由此，李浴日进一步指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仅是人生原理，也是国防原理，抨击当时国民党上下醉生梦死、穷奢极欲、国防不修的现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并希望发愤图强之思想。李浴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个人生原理，也是一个国防原理。大凡恶忧患喜安乐，人之常情，也是一种劣根性的表现。所以举国上下个个都是醉生梦死，穷奢极乐，必致国防不修，其亡无日。反之，人人出门如见敌，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国防建设，必可永远立国于大地之上。”（《兵学随笔第一辑·一个国防原理》）

三、将帅观

（一）选将不易，将将尤难；将必良材，将将者须有天才。历代兵家都非常重视将帅的论述，李浴日亦不例外，且在前代兵家理论上多有发展，更为通俗而精辟地提出：“将如不良，有将与无将同，兵如不精，有兵与无兵同，器如不利，有器与无器同，险如不守，有险与无险同。故曰：‘将必慎选，兵必勤练，器必求利，险必善守。’”

（《兵学随笔第一辑·有无相等》）选将固然不易，然将将更难。所以，李浴日在纵观历史的基础上，深含哲理地阐发将将之难说：“将

兵难，将将尤难，将将要能知将，用将，练将，储将，爱将，养将，信将，激将，赏将，罚将。将将要天才，技术上尤不可不讲求。中国历史上不善于将将者如项羽、曹操是。善于将将者有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赵太祖等。”（《兵学随笔第一辑·将将》）李浴日又指出：“其实，天才的军人能武，亦能文，是军事家，也是文学家。中国军人之有文学天才，似为一种传统。”（《兵学随笔第三辑·是军事家也是文学家》）

（二）将帅的类型。李浴日一生身在军戎，精研历代将材，遍观其人，对将之类型有精彩之阐述，云：“依业绩的分类，一是将相型：属于此型的人，即所谓是军专家，也是政治家，是指导战略政略并发挥国力的将帅。二是儒将型：属于此型的人，是文质彬彬，声望素孚，精通儒学的将帅。三是战将型属于此型的人，即百战百胜，立功疆场的武将。四是总督型：属于此型的人，是总揽军务，又胜任行政事务的将帅。五是技术型：属于此型的人，即致力于兵器的改良，火药的研究，新武器的发明而有着成绩的将军。依统帅方法的分类，一是德望型：属于此型的人，道德崇隆，品格高尚，众望所归，不令而行的将帅。这一类型的将帅，且往往成为当时人人崇拜的伟人。二是权威型：属于此型的人，是纪律严明，以威势统御部下的武将，即发挥统帅威力的武将，历史上著名的武将，多属于此型。”（《兵学随笔第四辑·将帅的类型》）

（三）将帅的能力与素质。

1. 将帅带兵要有能力，要带成“父子兵”，说：“能带兵的人，

没有兵带，问题还小，倘若不能带兵的人而给他带兵，真是危险万分！动不动就葬送数十万的生命，动不动丢掉数千里的土地。”（《兵学随笔第一辑·能带兵方可带兵》）“欲带成‘父子兵’，实非易事，既要‘共同甘苦’，尤要‘亲爱精诚’，唯有这样，方能死生与共，完成任务。”（《兵学随笔第一辑·父子兵的基础》）

2. 将帅既要具备战略思想，又要具备政略思想，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李浴日说：“现代战争是国力的战争，战略与政略并重，为统帅者应依于有形的战力与无形的战力的发挥而使敌发生必败之念为主眼。所以战力的充实与将兵一致的行动——应成为将帅之分内事。所以为将帅者要擅长战略，亦要具有政略的卓越识见。”（《兵学随笔第四辑·将帅的类型》）

3. 带兵要严，严能出战斗力。李浴日说：“‘带兵如带虎’，所以带兵官对于无知识的士兵，约束尚严，不宜宽，要郑重将事，不可视同儿戏。否则，他们将如出槛之虎，使人民畏兵如畏虎，把社会弄得一团糟。原来士兵来自各地，良莠不齐。穷莫如士兵，又莫胆大如士兵，且他们又操有杀人的武器，如果不临之以严刑峻法，那他们有什么不敢为呢？所谓‘兵即匪’，‘兵不匪分’之评，虽似刻毒，并非无由。故带兵尚严，战时尤尚严，要使其对敌如虎，不可使其对老百姓如虎。”（《兵学随笔第一辑·带兵如带虎》）

4. 将帅头脑要清明。李浴日说：“将校的头脑是将校祸福成败的主宰，故头脑常要清明，第一清明，第二清明，第三还是清明。清是清静，脑中毫无‘喜、怒、哀、惧、爱、恶、欲’，常保持古井般的

清静。明是明亮，头脑常如水晶体，能透视任何事物。能够这样，自可做到：‘决事知其变，末事知其来，伪事知其真，乱事使其理，危事使其安，祸事使其福。’自然个个将校都是要求自己头脑的清明，但我们所目见耳闻的则往往十不得一二，这固系乎先天的禀赋，尤关乎后天的修养，得修养之法，依修尽之法而行，即可使头脑清明，否则昏昧混沌，必致每战必败，杀身辱国。”（《兵学随笔第二辑·将校要有清明的头脑》）

5. 将者要研究和熟悉战史。李浴日说：“在战争频仍的春秋时代，中国产生了两部军事名著：一是孙子兵法，一是左氏春秋。左氏春秋所记载的大多为征伐攻守的事迹，开卷以「郑伯克段于鄢」为第一篇。所以它是一部战史的书，三国时代经学家隗禧曾有：「左氏直相斫书耳」的评语。其实，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相斫史，左氏春秋仅是一个短短期间的相斫过程的记录而已。战史是将校的导师，历代名将莫不读左氏春秋。虽然读了左氏春秋未必成为名将，凡为名将必读左氏春秋。”（《兵学随笔第三辑·论左氏春秋》）

6. 伟大的军人是实战家与理论家的统一。李浴日说：“将校是实战家，兵学家是理论家，两者可合不可分，但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人是实战家，又是理论家。”（《兵学随笔第一辑·实战家与理论家》）

（四）将帅三不朽。李浴日主张将帅应有三不朽的精神，做一番大事，结合史实阐述立德、立功不易，而为万世师法的立言之军人更不易。李浴日说：“军人的三不朽是什么？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应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历史上的代表者有关壮穆、文天

祥、史可法、李秀成等。立功应以在民族战争中的立功者为贵，如南仲、尹吉甫、管仲、李牧、卫青、霍去病、李广、班超、窦宪、谢玄、祖逖、李靖、刘仁轨、薛仁贵、韩琦、范仲淹、岳飞、戚继光、俞大猷、郑成功等。立言是指著书，如姜尚的《六韬》，孙武的《孙子兵法》，吴起的《吴子兵法》，司马穰苴的《司马法》，诸葛亮的《心书》，李靖的《兵法》（见杜佑《通典》），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与《纪效新书》，曾国藩的治兵言论，胡林翼的《读史兵略》等。可是，立德难，立功亦不易，立言更不易。在历史上立功的军人真是恒河沙数，而足为万世师的立言军人却不可多见呢！”（《兵学随笔第三辑·历史上不朽的名将》）

四、军事与政治关系观

（一）政治为军事之本。李浴日则吸取了前人的宝贵思想，认为政治为军事之本，说：“中国古代哲人的论战，都是先政治而后军学。即以政治为军事之本，政治不良，则军事难得胜利。今日所谓‘政治重于军事’，应以此为渊源吧！孔子答子贡的问政，以‘民信’列第一位，‘足食’列第二位，‘足兵’列第三位。又说过：‘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这都是把政治当为军事之本的。至于孟子荀子更有详明的指示，孟子曾对鲁穆公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又说：‘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再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荀子说：‘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

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又说：‘彼仁韬者，所以修其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即左传记载战术家曹刿的论战亦以政治为军事之本，原文是：‘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兵学随笔第二辑·政治为军事之本》）

（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论断最先由两千年前的中国人提出。李浴日说：“中国原是一个兵学昌明的古国，所以近代军事学上一切原理原则都早见于我国古兵书中，像现在一般人所常道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语，并不是《战争论》著者克劳塞维慈氏

（1780-1831）的天才的发明，最近我重读《战国策》，在《苏秦以连横说秦》一文中却发现了这个原理，该文记述这位外交家兼兵法家苏秦氏游说秦惠王说：‘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三皇五帝，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在二千年前中国兵学上已建立了这个高深的原理，今日真是足以自豪于世界！”（《兵学随笔第二辑·苏秦早于克氏的发明》）

五、游击战与游击战术

游击战与游击战术自古就有，在近现代许多军事家与军事理论家都提出了游击战与游击战术的思想，比如蒋百里、杨杰等，而毛泽东则提出了最为完备的游击战思想，写出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宏著。李浴日阐发游击战与游击战术思想说：

“孙子是中国游击战术的创始者，他的兵法十三篇是一切兵法的总汇，其中亦蕴藏着很丰富的游击战术。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

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这里所谓奇，就是游击战术的最高原则。又说：‘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又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又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这也是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至于以游击战起家的共产，其所惯用的‘以大吃小’，‘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术，并非共军的发明，实套自孙子，即前者套自孙子所说：‘以众击寡’的原则，后者套自孙子所说：‘以分合为变’的原则。孙中山先生也是中国现代游击战的领袖，他在辛亥革命前，屡次发动革命战争以推翻满清，所采用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当时活跃于粤桂边区的‘民军’，正今日所谓的游击队。孙中山先生于一九零七年命黄明堂适时攻占镇南关，又适时退出，这是一个典型的游击战。迄民十一，中山先生于‘军人精神教育’的讲词中又主张采用游击战术，以与北方军阀交战，所指出游击战术的五种技能——命中，隐伏，耐劳，走路，吃粗，仍可作为今日游击战术的技能。今日活跃于大陆上的游击队确要具备有此五种技能。大凡被统治者欲推翻统治者，往往以劣势兵力对优势兵力，以游击战始，以正规战（会战）终。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便是历史上顶有名的游击首领，推翻暴秦，首为其所发动。今日我们要打回大陆，推翻共产，亟应加强游

击战，其方式除军事战外，还要进行宣传战，组织战，渗透战，间谍战，经济战的游击战——应是总体战化的游击战。”（《兵学随笔·游击战与游击战术》）

六、遏制战争的根本方法是设计并实行合理的社会制度

李浴日既是兵学家，又是政略家，他提出：“欲永远制止世界的战争，维持世界的和平，还得从阶级平等，民族平等上去努力。换言之，非把世界现存那不合理的政治经济诸制度给它来个澈底的改革不可。”（《兵学随笔第四辑·原子弹杂感》）对战争发生的深层原因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思考，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进一步对这一问题阐述说：“在这个对立的世界里，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力，尤其犀利的武器为后盾，确不足以抑制世界野心的国家，但这也仅是治标的办法罢了，而治本的办法还是要从“道”（博爱与民主）的方面着手。”（《世界兵学月刊》第三卷第六期·李浴日《兵坛》）

七、战争中的物质与精神

战争中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兵学中常见的问题，人们往往持一偏之见。李浴日则辩证地分析物质与精神的互动，提出既要重视物质，也要重视精神，一面要准备物质胜于精神，一面要准备精神胜于物质，说：“我们一面要强调精神重于物质，一面还要准备物质胜于精神。在拿破仑以前的军事学说常强调精神重于物质。到了二十世纪以来，尤以在此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美军事学说，是一变为强调物质重于精神了。理论是行动的指针，所以盟军不论在欧洲战场，或太平洋战场，莫不以压倒的物质力量加诸敌人，造成辉煌的胜利。”（《兵学随笔

第一辑·精神与物质》)

八、特别重视武器的作用

李浴日既提出了物质与精神都重要的观点，又进而提出在物质方面，尤其要重视武器的作用，并批评了中国古代兵学家及西方克劳塞维茨对武器缺乏论述的缺点。李浴日说：“孟子并不是一个反战论者，他一向主张‘仁师’、‘义战’，他在用兵上，曾提示了一个制胜的原则：‘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两千年来，一般人莫不奉为金科玉律。可是到了今日，因武器进步所表现于战争的决定性，非加以修正补充不可。即应添入‘武器’这一个要素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武器，武器不如人和。’这是说，决定战争的胜败，以人和为主，武器次之，地利天时更次之。四者俱占优越，当可必胜。但今日的武器已可相当克服天时地理的困难，将来的威力自然更大，所以我们今后不应恃有天时地利，要致力于武器的发明与人和的养成。”

（《兵学随笔第二辑·应添入‘武器’要素》）又说：“中国古代的兵书多未提及武器的重要性，即西方克劳塞维茨有名的《战争论》，亦有此缺点。惟有《管子》一书，具有这个特点。其见解，正与现代欧美军事家的‘武器决胜论’相吻合，该书说：‘审器而识胜’。又说：‘器械巧则伐而不费’，再说：‘器备不行，以半击倍。’再又说：‘凡兵有六论：必先论其器……故曰：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无战。二器成，惊夫具，而天下无守。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无聚众。’其次桓公问以必胜兵器的制造问题，他答道：‘选天下之豪杰（即今所谓工程师），致天下之

精材（即上等原料），来天下之良工（即熟练技工），则有战胜之器矣。’美国今日之所以成为‘民主兵工厂’，不待说，由于具备着这三大条件。今后中国军政当局应特别研究《管子》。”（《兵学随笔第二辑·管子重视武器》）

九、用兵观

（一）用兵如治乐。曾国藩的日记上说：‘古人治兵之道，作诗之法，皆与音乐相通。’真是一个高深的兵学哲理。曾氏曾叹为‘懵然不知，深以为耻。’即现代一般兵学家亦有同感。其实，这个道理早见于孙子兵法的兵势篇上：‘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跟着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由此，可知音乐的奏演以善于变化与配合为妙，用兵之法，亦以善于变化与配合为妙。否则，不善变化与配合，徒拘于形式，这是艺之拙者，用兵之拙者。宋代名将岳武穆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亦即此意。西方兵家说：‘战争即艺术。’又说：‘指挥官为大艺术家。’可见真理的不分东西。（《兵学随笔第一辑·用兵与音乐相通》）

（二）用兵如富人造屋，必先做好充分准备。李浴日以美国珍珠港在1941年被日本偷袭以后一直想报复日本而所做的积极准备，终于在1944年夏开始实施对日反攻，准备充分而所向无敌，登陆夺岛，如所预期。故援引古人“用兵如富人造屋”之典故，说明战前准备必须充分，切不可仓促出战。李浴日说：“最近我读《苏东坡答李琮书》，见苏氏引用当时办理边事者王天常之言曰：‘国之用兵，正如私家之

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费，谷米之用，为钱若干，布算而定，无所赢缩矣。工徒入门，斧之声铿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复计，此虑不素定之过。既作而复聚粮，既斫而复求材，其费必十倍，其工必不坚。故帝王之用兵，如官人之造屋，其虑周，其规摹素定，其取材积粮皆有方，故其经营之常迟，而其作之常速，计日而成，不衍于素，费半他人，而工必倍之。’这个伟大的兵理，我们不应让其徒成为纸上的空文吧！”（《兵学随笔第二辑·用兵要如富人造屋》）

（三）用兵还需改善士兵生活。李浴日有感于当时国民党军队军纪涣散、战斗力不强等弊端，企图改变这种现状，故主张改善军人生活。这是一种很好的意见，但是从共产党军队看，则军人物质生活很差，而战斗力却很强，由此看来，单单改善军人生活而不重视信仰教育等精神层面，则于事无补，甚或造成贪图安逸和享乐的思想。李浴日说：“‘铁脚马眼神仙肚’，这是中国现代军中一种妙喻，也是中国现代军人生活的素描。‘铁脚’是说军人的两脚要如钢铁一般，方能支持长程的步行。‘马眼’夜能见路，是说军人夜间无灯，两眼要如马眼，方能走路。‘神仙肚’不用吃饭，是说军人有时没饭吃亦要能打仗。由此可见中国军人生活的艰苦，亦可见中国军人的难能可贵。不过像这种艰苦生活，只要稍加研究，便知是不合理的，久而久之，必致招来战斗力的衰弱和减耗。所以今后军人的生活不论在平时或战时必须使其吃饱，穿暖，行有车辆，暇有娱乐，达到合理化，现代化的标准。”（《兵学随笔第一辑·军人生活应改善》）

十、重视心理战

李浴日对古代兵法中的心理战术进行了梳理，提出“心理战”乃用兵之最高原则，说：“我国古代原无心理战专书，只是把它列入兵法书中，并视为用兵的最高原则而已。所以谈到心理战，在世界上应以中国为起源，其原理原则，像黑夜里的明珠，闪闪发光。最近我认为要研究心理战，非从我国古兵法去发掘不可。”（《兵学随笔第四辑·古代兵法上的心理战论》）

十一、兵学观

（一）重视兵学的作用。李浴日把兵学的作用提高到国家层面，提出“建国必先建军，建军必先建学”的论断。具体阐述道：“在历史上，我们不见有无军之国，亦未见有不学之军。不消说，无军之国，亡可立待，不学之军，战必败衄。建学在今后建军上将更趋重要，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则。因为今后建军工作的复杂性与专门化，须有兵学以为准绳，战争的科学化与机械化，尤须有兵学以为遵循。兵学不是‘纸上空谈’，是时代的号音，是智与血的结晶，是求生与自卫的工具，在今后不仅成为军人专有的智识，且为一般国民必备的智识，不论男女老少均要懂得兵学，它在吾人的生活上，正如布帛米菽。”（《兵学随笔第一辑·兵学的重要性》）

（二）建立救人的兵学精神。李浴日对比中日兵学，得出结论说中国兵学在于救人，西方兵学在于杀人，而杀人之兵学必将走入穷途末路。李浴日说：“欧美的兵学思想自克劳塞维慈以来已走入歧途了。即他们全以‘澈底歼灭’的杀人主义为本，所以到了工业发达之后，便竞相致力于武器的发明，尤其到原子弹发明之后，杀人的技术与威

力愈巧妙而猛烈, 一举便可杀人数十万, 像这种‘杀人’的兵学思想, 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 恐怕整个世界都要毁灭, 全体人类都要死亡了。在今日, 我们为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 非把‘救人’的兵学思想建立起来不可。我国向来的兵学思想, 都可以说是以‘救人’为本的, 像孔孟所倡导的‘仁师义战’; 老子所倡导的‘慈以战则胜’; 孙子所倡导的‘全国为上’, ‘不战而屈人之兵’; 吴子所倡导的‘绥之以道’, ‘五战者祸’; 又司马法所倡导的‘杀人安人, 杀之可也; 攻其国, 爱其民, 攻之可也; 以战止战, 虽战可也。’这种崇高的学说, 实值得我们今日再来倡导, 澄清目下世界上正在鼓吹着的以‘杀人为本’, ‘杀得愈多, 其功愈高, 名愈大’的兵学界的思想, 尤其军人的思想! 我们主张原子弹的运用以‘止战’, ‘救人’。我们应大声疾呼, 建立以‘仁义为经, 以和平为纬’的救人的兵学思想。”(《兵学随笔第四辑·建立“救人”的兵学思想》)

(三) 兵学与儒学通。

李浴日博通古今, 对兵学与儒学之关系多有思考, 认为兵学与儒学相通, 消除和打破了兵学与儒学的两千多年来的隔膜和壁垒。实际上, 李浴日所言兵学与儒学相通, 是既指在救人救世的精神而言, 又在处事做人方法而言, 而处事做人则在兵家与儒家思想中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李浴日说: “古人说: ‘兵事乃儒学之至精。’ 应是说精通儒学者, 能文亦能武, 能入相亦能出将。原来儒学之先师孔子以六艺教人(其中射御, 即军事教育, 至于礼乐书数亦与军事有关), 又深信自己必能将兵说: ‘我战则克。’ 可见孔子能文能武, 文武合一是

儒家的基本精神。在历史上，如汉之陈汤、赵充国、祭遵、皇甫规、虞诩，蜀之孔明，晋之羊祜、杜预、陶侃、谢玄，唐之李靖、张巡、李光弼、郭子仪，宋之曹彬、范仲淹、韩琦、岳武穆、虞允文，明之刘伯温、王阳明、戚继光、史可法，清之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均为精通儒学之名将。再证之古人云‘古来名将出通儒’，如《易经》的道理，前人已演为兵法，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道理，亦与战理相通，近有人著《论语兵学》一书，那么大家对这个名言的意义更可充分了然。”（《兵学随笔第一辑·兵事乃儒学之至精》）

李浴日军事思想涉及到军事理论的各个方面，体系庞大，论述精微，以上所述仅为其粗略的概述，尚不足以全面而详备地描摹其思想全貌。

完稿于2011年2月

作者简介：李桂生（1967-），男，中国江西省宁都县人，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鄂东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兵学、中国管理哲学。

E-mail:liguisheng89@yahoo.com.cn